

清代伊犁锡伯营综述

吴元丰 赵志强

乾隆年间,清政府从盛京及其所属诸城,抽调部分锡伯官兵,连同家眷迁到新疆伊犁,编为一营,即伊犁锡伯营。它是军政合一的组织,具有军事、行政和生产三项职能。在近一个半世纪内,伊犁锡伯营军民为保卫和建设祖国西北边疆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一、锡伯营设置的背景与原因

伊犁地区在我国的西北边陲。清代的伊犁地区,北接巴尔喀什湖,西连楚河、塔拉斯河流域,“东与乌鲁木齐所属精河接界,东北与塔尔巴哈台(今塔城)所属阿鲁沁达兰卡伦接界,南与阿克苏所属噶克察哈尔海台接界,东西一千五百余里,南北一千一百余里”^①。清政府在统一了新疆天山南北后,所面临的是如何巩固统一局面。伊犁本“地处极边,形势四塞”^②,且“数十年以来,兵革相寻,群遭涂炭”^③,已是千里空虚,渺无人烟,防务全废。唯有派兵驻防,开垦屯田,才能加强边防,巩固统一。

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,阿桂“由阿克苏率满洲、索伦骁骑五百名、绿营兵百名、回子三百名,越木苏尔达巴罕至伊犁,镇守办事,搜捕玛哈沁,招抚溃散之厄鲁特,即以绿营兵筑城,回子乘时兴屯,开渠灌溉”^④。嗣后,清政府一面继续从天山南部诸城移民屯田,一面陆续由内地增派兵丁驻防,并于乾隆二十七年(1762年)创设伊犁将军,命明瑞为首任将军,驻伊犁惠远城,总理天山南北二路军政事务。明瑞到任后,仍感伊犁驻防兵力不足,防务不甚坚固,于乾隆二十八年(1763年)具折奏称:“闻得,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,其中有锡伯兵四五千名,伊等未甚弃旧习,狩猎为生,技艺尚可”,“于此项锡伯兵内,拣其优良者一同派来,亦可与黑龙江兵匹敌”^⑤。明瑞的这份奏折进呈后,乾隆帝立即批准施行。究其原因,主要有以下两点。

其一,伊犁地处边陲,战略地位非常重要,需要强有力的兵驻守。锡伯族本为东北渔猎民族,骁勇强悍,善于骑射,清初就被编入满洲八旗,分驻东北三省和京师诸地,并曾从征准噶尔、大小金川等,不少人荣立战功,具有一定的声望。实际上,从盛京及其诸城抽调移驻伊犁的锡伯官兵,也确实年轻力壮,技艺娴熟。乾隆三十年(1765年)锡伯兵抵达伊犁后,参赞大臣爱隆阿具奏:“亲临查看得,兵齐丁多,老幼甚寡,男女老少衣服被褥俱全,所带兵器尚为齐全,途中虽有损坏者,但为数不多,均可修补。又借此之便,令其兵丁演习马步箭,其中谙练者众,不谙练者稍加训练,均可成为强兵”^⑥。

其二,让几个民族同处一地,互相牵制,这也是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而实行的政策

① ②《钦定新疆识略》,卷4,页1。

③ 徐松:《西域水道记》,卷4,页11。

④ 《钦定新疆识略》,卷6,页1。

⑤ 军机处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满文月折档(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,以下同)。

⑥ 军机处乾隆三十年八月满文月折档。

之一。早在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,清政府筹划派兵驻守伊犁事宜时,乾隆帝曾降旨曰:“至所议索伦兵丁,前往新疆管辖厄鲁特事宜,毋论远道迁移,事属不便,且索伦素属骁勇,若与厄鲁特聚处,势必染其余习,将来渐不可用,甚属无益”^①。从这条谕旨中不难看出,清政府对新疆地区民族的组成采取一种控制政策,防止“素属骁勇”的民族聚属一处,恐其日后滋事。在锡伯兵移驻伊犁之前,清政府已经往伊犁陆续调拨一定数量的甘肃省凉州、庄浪的满洲官兵,陕西、甘肃两省的绿营兵,黑龙江省的索伦,达斡尔官兵及张家口外察哈尔官兵,但仍感兵力不足,需增派官兵。当时,满洲官兵驻防全国重镇要地,不敷调遣,而蒙古、绿营、索伦、达斡尔官兵,已经调拨一部分,不便再调。唯独盛京驻防八旗的锡伯兵,“近几年出征时,未曾遣派”^②。因此,从盛京及其所属各城抽调锡伯官兵,连同家眷迁往伊犁,设营驻防,也就势在必行了。

二、锡伯营的设置及其沿革

乾隆二十九年一月七日(1764年2月8日),盛京将军舍图肯接到兵部咨文,令锡伯官兵移驻伊犁事宜。遂经“查得,盛京所属各城有锡伯协领二员、佐领二员、防御十九员、云骑尉一员、骁骑校三十六员,共六十员,兵三千九百一十四名”^③。并从中拣选“盛京防御一人、骁骑校二人、兵四百有四名,凤凰城防御一人、兵四十五名,辽阳城防御一人、骁骑校二人、兵六十六名,开原城防御一人、兵九十四名,牛庄城防御一人、兵二十三名,广宁城骁骑校一人、兵六十名,熊岳城防御一人、兵五十一名,复州城防御一人、骁骑校一人、兵五十二名,秀(岫)岩城骁骑校二人、兵二十八名,金州城防御一人、兵四十四名,盖州城防御一人、兵十五名,锦州城防御一人、兵二十四名,义州城骁骑校二人、兵六十一名,兴(京)兵二十三名,抚顺城兵十名”^④。共计防御10员、骁骑校10员、兵1000名,携其家眷3,275口迁往伊犁驻防。但实际迁到伊犁的锡伯族人并不止4,295名。乾隆三十年(1765年),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奏称:“据护送一千名锡伯官之协领阿穆呼郎、噶尔赛呈称:‘去岁,我等前来时,除已入印册之人口外,沿途陆续新生男女幼童共三百五十余名。此外,我等于途中查出跟来之闲散四百余名,当即询问伊犁,皆答称系官兵之兄弟子女,由原籍起程时,即随而来。其中,男二百四十七名,女一百五十八名。实系起程时,跟随而来,并无他故,惟印册内无其名额,’等因具结前来”^⑤。按以上各数计算,当年实际迁到伊犁的锡伯族男女老少,连同中途逃亡者,共为5,050名。

盛京所属各城被选中的锡伯族官兵都集中到盛京城(今沈阳市)后,分编为两队,“第一队派去之防御五员、骁骑校五员、兵四百九十九名,官兵之家眷共老少一千六百七十五口,一并交协领阿穆呼郎赛管带,已于四月初十日起程。第二队派去之防御五员、骁骑校五员、兵五百零一名,官兵之家眷共老少一千六百口,一并交协领噶尔赛管带,已于四月十九

① 《清高宗实录》,卷530,页17~页19。

② 军机处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满文月折档。

③ 军机处乾隆二十九年一月满文月折档。

④ 《清朝文献通考》(商务印书馆),页6423。

⑤ 军机处乾隆三十年九月满文月折档。

日起程”^①。锡伯官兵从盛京城起程后,出彰武台边门,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,于八月二十四、二十五日抵达乌里雅苏台(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哈郎特)。农历八月末的蒙古高原,已是青草枯萎,寒气袭人的季节,锡伯官兵托儿带女,无法继续行进。于是,在乌里雅苏台扎营过冬,等候来年春草返青,再赶赴伊犁。锡伯官兵在乌里雅苏台过冬,并得到食粮和牲畜的补充后,于乾隆三十年三月初十日(1765年4月29日)起,先后起程,经过科齐斯山、珠鲁呼珠、察罕霍吉尔、阿尔勒坦额、沙喇乌苏、额米勒、巴图鲁克、博罗塔拉等地,于七月二十二日,先后抵达伊犁。此时,因耕耘季节已过,未立即派往指定的驻防屯田之处,而“将伊等仍交护送前来之协领阿穆呼郎、噶尔赛等管束,暂住乌哈里克空城(即绥定城)”^②。至乾隆三十一年一月(1766年2月),锡伯官兵及其家眷乘伊犁河结冰,相继过河,迁到指定驻防屯田之地,即“伊犁河之南,惠远城对面之巴图蒙柯巴克、绰豁罗拜兴迤西,至豁吉格爾巴克一带”^③。

锡伯官兵迁到伊犁后,未照原籍盛京之例,分编入满洲或蒙古八旗内,而“按照索伦、察哈尔、厄鲁特之例,”“亦设为一昂吉,下编六牛录。其中四牛录各为领催、披甲一百六十七人,两牛录各为领催、披甲一百六十六人”^④。昂吉设有领队大臣、总管、副总管各1员。领队大臣驻惠远城,其办事机构称为领队大臣档房,设委笔帖式2员,专理文书事务。总管、副总管的办事机构称为总管档房。各牛录设有佐领、骁骑校各1员,其办事机构称为旗下档房。

乾隆三十二年(1767年),伊犁将军阿桂奏请:“移驻伊犁之索伦、锡伯、察哈尔兵、按新厄鲁特例,编设牛录。故不论旗分,曾以近二百户为一牛录,每爱曼各设六牛录。今生齿日繁,一切差使等项又烦冗,如仍旧责成六牛录官员管理,实属不足。再两翼厄鲁特中,右翼人众,且陆续来归之厄鲁特,较前亦多。将此只责成六牛录官员管束,则亦不足。明瑞曾于朝觐时,奏厄鲁特足够编两牛录,奉旨准行,除照办外,其锡伯、索伦、察哈尔等三爱曼,亦请同厄鲁特爱曼,增编两牛录,俱为八牛录,以为八旗。”“又锡伯、索伦、察哈尔、厄鲁特牛录,即已各为八旗,其旗纛颜色,亦按旗授之。……原有左右两翼(厄鲁特)总管关防、锡伯、索伦、察哈尔总管关防及锡伯、索伦、察哈尔、厄鲁特佐领图记所铸之字,均已不合,应照现在整饬之例,重新改铸颁发,以标旗色”^⑤。奉旨施行。这次整编未增加兵额,而于原有佐领、骁骑校各6员外,增设了佐领2员、骁骑校2员、空蓝翎4员,并将原有1000名兵均分为八旗,每旗各设一牛录,每牛录各为领催4名,披甲121名。在此基础上,又颁发了新的总管关防和佐领图记,以及镶黄(一牛录)、正黄(二牛录)、正白(三牛录)、正红(四牛录)、镶白(五牛录)、镶红(六牛录)、正蓝(七牛录)、镶蓝(八牛录)八种颜色式样的旗。

乾隆五十七年(1792年),经将军保宁奏请,每旗各设委官员1员、空金顶8员。嘉庆十九年(1814年),经将军松筠奏请,将满营空蓝翎二缺移至锡伯营。道光八年(1828年),

① 军机处乾隆二十九年四月满文月折档。

② 军机处乾隆三十年八月满文月折档。

③ 军机处乾隆三十一年一月满文月折档。

④ 宫中满文朱批奏折明瑞包第4号。

⑤ 军机处乾隆三十二年七月满文月折档。

为了加强伊犁地区防务力量,经钦差大臣那彦成奏请,锡伯营增添甲兵300名,从闲散丁内挑选披甲,并从中拣选前锋40名,其中选设委前锋校4员。同时,将锡伯营分为左右两翼,每翼各设防御2员^①。至此,锡伯营制最终确立和完善。锡伯营下设8旗,每旗下设1牛录,设有领队大臣1员、总管1员、副总管1员、佐领8员、防御4员、骁骑校8员、前锋校4员、委官8员、空蓝翎6员、空金顶64员、委笔帖式2员、领催32名、前锋36名、披甲1,296名。

1911年辛亥革命后,清朝虽已灭亡,但伊犁锡伯营制仍旧保留,直到1938年才被废除,成立河南设治局,不久改为河南县。1939年改称宁西县。1954年3月17日,成立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。

三、锡伯营的几项定制

(一)锡伯营官员的补放、考核、引见。锡伯营的领队大臣,一律由京城满洲八旗或蒙古八旗官员内钦定补授,不准从本营官员内挑补。总管、副总管,起初“于此处(伊犁)戍守大员中,不论满洲、索伦,拣选二人”^②补放,不久即改由锡伯营官员内拣选补放。锡伯营的总管、副总管、佐领、防御、骁骑校、前锋校出缺后,先由领队大臣呈报伊犁将军,而后再由伊犁将军于锡伯营应升人员内,逐一拣选,每一缺,拟正1人,拟陪1人,缮写拟正拟陪人员的履历,具折奏请,钦定其中一人补放。新补放的总管、副总管和佐领,遇有差便,即送京引见。每隔五年,伊犁将军亲自对锡伯营官员进行一次军政考核,视官员的品貌、技艺和年龄,保举卓异之员1名,据实出具考语,奏明注册,乘便送京引见。若有年逾六旬、气力衰退和技艺欠佳者,则奏请休致。此外,锡伯营总管,每任职“六年期满后,诚系劬劳,人材亦可,皇上堪以拣补领队大臣者,出具考语,据实奏闻,送部引见,恭候钦定”^③。

(二)锡伯营兵的挑补和操演。锡伯营额设兵为1,332名,遇有出缺,即于闲散壮丁内择优补充,不得留有空缺。锡伯营设有校场,每年秋收后,总管佐领等员率领兵丁操演骑射^④。每年夏秋,领队大臣、总管等员率领从各旗挑选出来的一部分兵丁,随从伊犁将军赴哈什一带,与满洲、索伦等官兵一起行围操演^⑤。

(三)锡伯营官兵的兵器。锡伯营官兵主要配备弓箭、撒袋、腰刀和长枪,不配备鸟枪即火枪。总管配有战箭250枝、撒袋1副、弓2张、腰刀1把,副总管、佐领每员配有战箭200枝、撒袋1副、弓2张、腰刀1把、骁骑校每员配有战箭100枝、撒袋1副、弓2张、腰刀1把,披甲每名配有战箭50枝、弓1张、腰刀1把,每二名还配有长枪1杆^⑥。锡伯兵在盛京时,“有十人内有二人持鸟枪之例”^⑦,故移驻伊犁的1,020名官兵“带来鸟(枪)三百七十杆”^⑧。但清政府恐锡伯官兵“凡行围操演,皆从简使枪,久而久之,反误马步箭,”遂命伊犁

① 见军机处道光八年九月满文月折档。

② 宫中满文朱批奏折明瑞包第10号。

③ 军机处嘉庆十年七月满文月折档。

④ 见《西陲总统事略》,卷6,页11。

⑤ 见《钦定新疆识略》,卷7,页3。

⑥ ⑦ 军机处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满文月折档。

⑧ 《钦定新疆识略》,卷7,页10。

将军“将伊等私有鸟枪，皆没收禁用”^①。官兵配备的兵器不得短缺或损坏，每年年终由领队大臣负责查看，并呈报将军。若有短缺或损坏者，则经将军奏请，由西安等地制办运来，作价卖给。

(四)锡伯营兵的俸禄钱粮。锡伯营官兵不象满营官兵，“有粮有银”，而“有银无粮”^②。总管岁支俸银130两，副总管岁支俸银105两，佐领每员岁支俸银105两，防御每员岁支俸银80两，骁骑校每员岁支俸银60两，轮驻卡伦蓝翎每员岁支盐菜银10两、口粮1,440石，委笔帖式每员岁支盐菜银36两，披甲每名岁支钱粮银36两，前锋每名岁支钱粮银30两，披甲每名岁支钱粮银24两。另外，官兵承应远差，还每人月支盐菜银一两五钱。

(五)锡伯营兵的随缺地亩与公仓。锡伯营官兵“按名分给地亩，各令自耕自食，某人耕者，即为某人世产”^③。其具体分配办法是，按官缺的品级分配，故称随缺地亩。总管480亩，副总管360亩，佐领240亩，防御180亩，骁骑校120亩，委官、领催和披甲各60亩。官员分得的土地甚多，无法自力耕种，依靠其跟丁。跟丁也按官缺的品级配给，总管有16名，副总管有12名，佐领有4名，防御有3名，骁骑校2名。跟丁由各旗摊派，每二年或三年更换一次，自备口粮，每月允准回家半个月，但交“代役金”。他们除承应一些官差外，主要为官员耕种土地。披甲无事则耕耘，有事则应付，其家眷和闲散则专意务农，并养鸡畜豚^④。另外，锡伯营“八旗各设公仓一庄，将射耕佣耕之余，按年交粮”^⑤，公仓存贮粮石，除接济嫠寡孤独者外，在青黄不接时，还借给官兵，以解燃眉之急。

四、锡伯营担负的主要任务

锡伯营作为伊犁驻防八旗的一部，平常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项。

(一)驻守卡伦。清代，在伊犁设置将军，总统天山南北军政事务，并陆续移驻各项携眷兵14,000余名。从而伊犁不仅成为“新疆都会”，而且成为西北边陲的军事重镇。当时，伊犁将军、参赞大臣及诸领队大臣都驻伊犁河北的惠远城，由满洲营驻守。城之西北霍尔果斯河一带，由索伦营驻守屯田；城北有绥定、广仁、瞻德、塔勒奇、拱宸等五城，由绿营驻守屯田；城之东北博罗塔拉河一带，由察哈尔营驻守屯牧；城东有惠宁城，由满洲营驻守；城之东南特克斯河一带，由厄鲁特营下五旗驻守屯牧；城南之伊犁河南边，由锡伯营驻守屯田；城之西南察林河上游一带，由厄鲁特上三旗驻守屯牧。除惠远城满洲营和绿营外，其他各营均委派官兵驻守卡伦。卡伦“有常设、移设、添撤之分。历年不移而设有定地者，是谓常设之卡伦”；“住卡官兵时在此处安置，有时移向彼处，或春秋两季递移，或春冬两季递移，或春夏秋三季递移者，是谓移设之卡伦”，“其地虽有卡伦，而有时安设，过时则撤者，是谓添撤之卡伦”^⑥。锡伯营官兵驻守的卡伦基本上都集中在伊犁河南，共有18处。其中，固

① 军机处乾隆三十三年七月满文议复档。

② 《钦定新疆识略》，卷8，页1。

③ 同上书，卷6，页12。

④ 见上书，页18。

⑤ 《清朝文献通考》，页7650。

⑥ 《钦定新疆识略》，卷11，页2。

尔班托海、安达拉、春稽和大桥等4卡为常设卡伦,沙巴尔托海、托里、玛哈沁布拉克、额木纳察罕乌苏、辉图察罕乌苏、塔木哈、察哈托海、托赖图、额哩音莫多、头勒克、察林河口、塔木哈色沁等12卡为移设卡伦,乌里雅苏图、沙喇托罗海等2卡为添撤卡伦。以上18处卡伦,每卡各派驻官员1名、兵丁4至10名不等^①。

(二)赴塔尔巴哈台、喀什噶尔换防。塔尔巴哈台“非但与伊犁毗连,且通阿尔泰、科布多等地,虽于伊犁驻兵,而塔尔巴哈台不驻,则西北两路,声势不能呼应,唯塔尔巴哈台驻,周围环设卡伦,则西北两路方能彼此呼应,伊犁军威,将更为强盛”^②。鉴于此,乾隆二十九年(1764年),参赞大臣绰勒多由乌鲁木齐率绿营兵600名到塔尔巴哈台地方屯种建城,并派京师健锐营及黑龙江索伦兵900名驻守。乾隆三十一年(1766年),改由伊犁驻防满洲、锡伯、索伦、察哈尔、厄鲁特五营内派拨官兵1,200名驻守,其中锡伯兵100名。因“锡伯昂吉官员,皆系新任,不得堪授营长之人”^③,故此次未委派官员。不久,经伊犁将军奏请,额定由伊犁派驻塔尔巴哈台官兵为1,300名,其中锡伯营佐领1员、骁骑校1员、兵130名。塔尔巴哈台换防官兵内,满洲、锡伯官兵二年一换,每年换一半;索伦、察哈尔、厄鲁特官兵一年一换。喀什噶尔系南疆重镇,又系中西交通要道,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,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一员,总理南疆各城事务,并由乌鲁木齐、古城、西宁等地派兵驻守。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起,由伊犁驻防满洲、锡伯、索伦、察哈尔四营内派拨官兵换防,其中伊犁“两城满洲兵内派出五百名,锡伯、索伦、察哈尔兵内派出一百名,”二年一换,每年一半^④。不久,免派索伦、察哈尔兵,仅派满洲、锡伯兵换防^⑤。至嘉庆三年(1798年),经伊犁将军保宁奏请,额定伊犁派往喀什噶尔换防兵仍为600名,其中满洲兵300名,锡伯、索伦兵各150名^⑥。由伊犁赴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换防官兵的数额,并不是一成不变的,而是随着各地区形势的变化,时有增减。

(三)巡查布鲁特和哈萨克游牧地界。布鲁特游牧在伊犁西南,哈萨克游牧在伊犁西北和东北,此两处均未派兵常年驻守,而是每年由伊犁派兵巡查一次。这种巡查,属例行公事,其目的是防范偷盗,查禁擅自越界放牧或开垦种田,并查收马税。届时由伊犁将军奏派领队大臣一员,率领由满洲、锡伯、索伦三营选派的官兵,前往巡查。每次出行,往返约需一至两个月时间。按规定,锡伯营每年派60余名官兵,与满洲、索伦官兵一起,分队巡查布鲁特和哈萨克游牧地界。

(四)牧放滋生牲畜。清政府为了解决军队和屯田所需的牲畜,在伊犁驻兵屯田的同时,还设置了滋生牧场,分别交锡伯、索伦、察哈尔、厄鲁特四营和屯田的维吾尔族牧放。乾隆三十一年(1766年)始,交给锡伯营牧放的滋生马近600匹、滋生牛300余头,并规定,滋生马“三年一均齐,即每三年本马一匹,取草马一匹”,滋生牛“四年一均齐,即每四年本

① 见《钦定新疆识略》,卷11,页10、11。

② 军机处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满文议复档。

③ 军机处乾隆三十一年五月满文月折档。

④ 见军机处乾隆三十六年三月满文月折档。

⑤ 见军机处乾隆三十八年三月满文月折档。

⑥ 见军机处嘉庆三年二月满文月折档。

牛十只(头),取犏牛八只(头)”^①。乾隆三十三年六月(1768年7月),伊犁将军阿桂奏称:“今查锡伯所牧滋生马匹,先后交给滋生马五百九十九匹,两年之间陆续倒毙者补偿外,今尚缺本马一百七十六匹。究其原因,伊等在原籍早弃豢养滋生牲畜之业,且每年前往楚呼楚(即塔尔巴哈台)换防及此处坐卡当差,耕种私田,又牧放私畜、滋生官马牛,略有难顾是实。若此二项牲畜,仍留于伊等牧放取犏,则于官犏无益,且其本身亦难免补偿之苦矣。纵其学习,亦一两年内不能学好。牛只一项,犹易于牧放滋生,若将伊等所有滋生牛只,仍留给伊等牧放外,现有滋生马匹,暂时抽出,交他受曼牧放。俟锡伯等稍学滋生之道,再得给滋生官马,则无赔偿之苦,于其生计亦有裨益。其倒毙本马一百七十六匹及两年牧放间例应取犏马八十七匹,本应令其一并赔偿,惟伊等抵伊犁后,即因雪大,牲畜倒毙,耕田遭受蝗灾,至今尚未适应。请将所倒本马照数赔偿,照例应取犏马,免其赔偿。”“锡伯等应赔骡马,若令伊等自行购买,则一时不能多得。此项马匹,请于前来贸易之哈萨克等所带骡马内,官买陆续补充,所需价银,由伊等钱粮内扣还”^②。遂奉上谕:“将此项马匹,著照阿桂所奏,由锡伯等抽出,交上三旗厄鲁特等牧放滋生”^③。当时伊犁将军阿桂认为,锡伯官兵牧放的滋生马匹大量倒毙,是因锡伯官兵不谙牧放滋生牲畜之道所致,所以设想,“俟锡伯等稍学滋生之道,再得给滋生官马。”实际上其主要原因是,锡伯官兵差繁重,加之耕种私田和牧放私畜,无暇尽心牧放滋生官马。事过30年后,至嘉庆三年(1798年),不仅未能实现阿桂“再得给滋生官马”的设想,而且所谓“易于牧放”的滋生牛只都很难牧放,经伊犁将军奏请,锡伯营停止牧放滋生牛只,移交屯田的维吾尔族牧放^④。

(五)兴修水利,开垦屯田。锡伯营官兵“除照例支給饷银外,所有口粮俱系自耕自食”^⑤,所以,锡伯营兵有事应差,无事耕耘。锡伯官兵移驻伊犁之初,疏浚了伊犁河南旧有的绰豁喀大渠(又称锡伯营渠或锡伯旧渠),并沿大渠分八屯垦种,“镶黄、正白二旗驻豁吉格尔、正红旗驻巴图蒙柯,引用泉水灌溉;镶白旗驻绰豁喀之西,俱引用河水灌溉”^⑥。后因人口逐渐增多,原有土地已不敷耕种,需要扩大耕地面积。但是,绰豁喀“渠北地隘,虑在无田;渠南阻岸,患在无水”^⑦,遂决定“于察布查尔山口引水,自岸凿渠”^⑧,引伊犁河水垦荒种田。嘉庆七年(1802年),锡伯营总管图伯特亲率锡伯营军民,破土动工,采取边挖渠边引水种田的方法,经过七年的辛勤劳动,至嘉庆十三年(1808年)挖成了一条深一丈、宽一丈一尺、长二百余里的大渠。因渠口开在察布查尔山口,故名察布查尔渠(又称锡伯八旗渠或锡伯新渠)。“既浚新渠,辟田千顷,遂大丰殖,雄视诸部”^⑨。

锡伯营官兵在自己居住的地区兴修水利,开垦屯田,保障供给,还奉命到其他地区,兴修水利,开垦屯田,积聚军粮。道光年间,锡伯营总管色布星额带领锡伯营兵丁,到伊犁河北岸,协助满营开挖了“皇渠”,引伊犁河水,开垦种田,以解决伊犁惠宁、惠远两城满营军

① 曾问吾:《中国经营西域史》(商务印书馆,1935年),页282。

② 军机处乾隆三十三年七月满文月折档。

③ 军机处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满文上谕档。

④ 见《钦定新疆识略》,卷10,页1。

⑤ 同上书,卷8,页3。

⑥ 同上书,页22、23。

⑦ ⑧⑨《西域水道记》,卷4,页18。

民的食粮问题。光绪初年,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率领锡伯营兵丁,在博尔塔拉、精河、库尔喀拉乌苏(即今乌苏)等地开垦屯田,积聚粮草,供给左宗棠所率进疆大军。光绪末年,锡伯营总管色普西贤率领一部分锡伯营官兵,到伊犁河上游的特古斯塔柳(即今巩留)地方,相度地形,开挖了一条长20余里的灌溉渠,称为特古斯塔柳锡伯渠。

五、由锡伯营拨丁补充索伦营兵缺与编设惠远城新满营

(一)由锡伯营拨丁补充索伦营兵缺。乾隆二十八年(1763年),从黑龙江调拨索伦、达斡尔兵各500名,携眷迁往伊犁。次年抵达伊犁,合编为1营,统称索伦营。索伦营设有领队大臣、总管、副总管各1员,佐领8员,防御4员,骁骑校8员,委官8员,笔帖式2员,领催、前锋、披甲及养育兵1,340名。

索伦营分左右两翼,每翼各设四旗,每旗各设一牛录。其左翼为索伦兵丁,分驻霍尔果斯河迤西沙马尔、齐齐哈尔、土尔根、撒橘等地(以上各地后被沙俄割占);右翼为达斡尔兵丁,分驻霍尔果斯河迤东克阿里木图、霍尔果斯、富斯克等地。索伦营驻守霍尔果斯河一带的旧霍尔果斯安达拉、齐齐哈尔达拉、霍尔果斯、齐齐哈尔、奎屯、博罗呼济尔、崆鄂罗鄂、辉发、河岸、奎屯色沁等大小10座卡伦^①,派兵到塔尔巴哈台、喀什噶尔换防,牧放滋生马牛。

至嘉庆二年(1797年),索伦营出现了严重的兵源危机,所出兵缺无丁选补。当时的伊犁将军保宁具折奏称:“窃查,伊犁索伦爱曼人口增长向来不佳,竟有绝裔之户,以前挑选披甲,即稍难选得强壮闲散成丁。不料去年出天花,该爱曼闲散幼丁亏损近四百人,现剩闲散丁甚少,亦皆年幼。是故,今挑选披甲,竟不得年力精壮者矣。详思,索伦爱曼兵,亦系一支劲旅,若不稍加调办,而以幼童为兵充数,或致减兵额,均不成事体。奴才留心察得,近数年来,锡伯爱曼人口增长颇佳,现有堪以披甲之闲散丁甚众。夫索伦、锡伯,俱系东三省人,习俗尚近,若将锡伯爱曼闲散丁,酌量移补索伦爱曼,即可得年力精壮之兵,且伊等自幼与索伦杂居一处,天长日久,技艺自然就学,均可成为壮健,得其力如同索伦”^②。而据《创修绥定县志》记载:索伦营“左翼以渔利为生,不谙耕耘,每偷盗边哈游牧劫夺牲畜后(时),竟成群结伙前往抢劫,被哈萨克两次杀死一二百名,将军不敢直陈入奏,籍水土不服,土兵遭瘟疫死亡过多,由河(即伊犁河)南锡伯营挑选壮丁补额”。此说甚难成立。当时,伊犁驻防各营军纪甚严,不准擅自越过各自的驻防地界行动,加之哈萨克游牧在巴尔喀什湖和阿尔泰山等地,索伦营兵丁,“成群结队前往抢劫”是很难做到的。另外,索伦营兵丁移驻伊犁后,确是长期水土不服,瘟疫不断,以致人口增长缓慢。早在乾隆三十一年(1766年)派兵赴塔尔巴哈台换防时,将军明瑞奏称:“锡伯兵方到,索伦兵去岁遭瘟疫,此两项兵内不能多派,锡伯兵派出一百名,索伦兵派出五十名”^③。无论是何原因,索伦营人口减少,无法挑补额定兵缺是实事。所以,经将军保宁奏请,并奉旨准行后,“于锡伯爱曼十八岁以上,二十三岁以下闲散壮丁内,选出立刻堪以选入披甲者一百六十户,移至索伦爱曼,按各该牛录闲散

① 见《钦定新疆识略》,卷11,页4。

② 宫中清文朱批奏折朝年包第745号。

③ 军机处乾隆三十一年五月清文月折档。

丁额之多寡,分补选甲”^①。从而解决了索伦营的兵源危机,使兵力得到加强。

但是,至道光十三年(1833年),由于征战伤亡,索伦营再度出现了兵源危机。索伦营领队大臣奇成额呈文伊犁将军特依顺保曰:索伦“爱曼人口增长,向来较差。道光六年、十年,喀什噶尔出征官兵内阵亡者二百三十余名,其所遗之缺,皆选身材较高之闲散,补充兵缺当差。现有闲散丁,皆年幼尚未长成。故八旗披甲缺,委实不能选补。可否仍照前例,由锡伯爱曼再挑闲散一百名,连同家眷,一并移入索伦爱曼,以备拣选披甲”^②。遂经将军特依顺保转奏,“照前办之例,由锡伯爱曼拣选闲散丁一百名,连同家眷,一并移入索伦爱曼,均匀分至备该牛录,以备拣选披甲”^③。伊犁将军先后两次奏请,由锡伯营共挑选闲散壮丁260户,拨归索伦营,以备选补兵缺。这对加强霍尔果斯河一带的防务,促进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,无疑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
同治年间,伊犁地区发生战乱,沙俄入侵占领霍尔果斯河迤西地区后,索伦营一半官兵及其家眷纷纷逃难到塔尔巴哈台。光绪八年(1882年)收复伊犁后,一部分返回伊犁索伦营,另一部仍留居塔尔巴哈台,被编入该地的新满营。其中就有一部分锡伯族人,今塔城地区的锡伯族人,绝大部分就是他们的后裔。

(二)由锡伯营拨丁编设惠远城新满营。

惠远城,位于伊犁河北岸,乾隆二十八年(1763年)修筑。后为河水所浸,城墙倒塌。光绪八年(1882年),在城之东北,仿旧城筑新城,仍称惠远城。当地人为了区别于旧城起见,又称新城。伊犁将军驻此城,是当时新疆的第一重镇和首府。伊犁参赞大臣,各营领队大臣也驻此城。城内驻有乾隆年间自热河、凉州、庄浪携眷移驻的满蒙官兵,共4,370名,称之为惠远城满营。该营由伊犁将军和参赞大臣亲自管带,下设协领8员,佐领、防御、骁骑校各40员,分管各项具体事务。惠远城满营除驻守城池外,还派兵到塔尔巴哈台、喀什噶尔等地换防,并定期巡查边界。

同治年间,发生战乱,沙俄乘机占据伊犁。在此期间,伊犁各营兵丁伤亡甚重,营制全废。光绪初年,清政府收复伊犁,开始恢复营制。原惠远城满营所存人口编为一营,称惠远城旧满营,但是,此时惠远城满营的兵额,远远不足原先惠远城满营的定额,防务力量极为单薄。光绪九年(1883年)为加强惠远城的防务力量,经伊犁将军金顺奏请,由锡伯营挑选佐领5员、防御4员、骁骑校6员和闲散丁3,185名,连同家眷移驻惠远城,编为一营,称惠远城新满营。营下设4旗,每旗5牛录,旗设协领1员,牛录设佐领、防御、骁骑校各20员,兵2,000余名。

1911年辛亥革命后,惠远城新满营的锡伯官兵及其家眷,绝大部分相继返回旧地伊犁河南,极少部分迁往巩留等地。

(吴元丰: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;赵志强: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)

本文编辑牛平汉

① 宫中满文朱批奏折朝年包第745号。

② ③ 军机处道光十三年十一月满文月折档。